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增 刊

台、港及外国对民国史研究的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编

中 华 书 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增 刊

台、港及外国对民国史研究的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编

(内部参考)

中 华 书 局

1982年6月

K255.06
43

中
国
民
国
史
研
究
丛
刊

增
刊

台
港
及
外
国
对
民
国
史
研
究
的
反
响

中
华
书
局

内部参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增 刊

台、港及外国对民国史研究的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82年6月印刷 定价：0.95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前 言

这里收集的是外面针对我们的民国史研究工作而发表的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大部分是我国台湾方面的，也有香港方面的以及其他国家的。

我所民国史的编纂研究工作，自一九七二年开始，今年已满十年。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不够理想，但在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协作下，十年来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除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已出版了第一编上、下两册外，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名义，编印出版的（征求意见稿）《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人物传记》和《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资料，至一九八一年底共有五十九辑；以同样名称正式出版的有《民国人物传》三卷、《胡适来往书信选》等专题资料十种；此外，还编撰了《孙中山传》、《袁世凯传》等专著。

民国史研究工作，不仅在我国大陆上受到史学界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的关注，并且也在海外历史学者中引起了注意和评论。当然，海外历史学者的评论意见是各式各样的。它在我国台湾方面引起的评论，最为强烈。隔着海峡的部分同行，竟把我们这项工作比做“台风过境”一样而感到“震惊”，从而近两年多来他们讲了不少的话，甚至作了些不必要的揣测。姑不论他们讲些什么，但我们还是应当了解这些反响的。现在我们把台湾方面的文章，连同其他各国同行们近两年的评论，编成这本册子，供我们自己和关心这项工作的同志们参考。为使同志们如实了解各种评论，我们一概原文照录，未作删节和改动。

近几年来，台、港地区以及日、美、法等国史学界都兴起民国史的研究，有的建立了专门机构。估计今后评论或商讨性的文章，会越来越多。现在我们仅就接触到的一些报刊资料加以编集，可能是很不完全的。期望同志们能够向我们推荐有关这类文章，以便继续把它收入，使之更加充实起来。

这本册子的编辑工作是在孙思白同志指导下，由严如平、陈民两同志负责编辑，得到了沈自敏、曾业英、齐福霖三同志协助。另外，中国新闻社的同志和郑则民同志为我们提供了部分资料，谨向他们致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民国史研究座谈会”开场白·····台湾《传记文学》编者	(1)
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李 璜	(3)
我对纂修中华民国史的看法·····沈云龙	(9)
修纂民国史的三个层次·····张玉法	(14)
撰写中华民国史应该进入实行阶段·····蒋永敬	(16)
我的乐观看法与自信·····李云汉	(18)
对纂修民国史的几点意见·····梁敬鐸	(20)
试谈民国史编修的积极意义·····李 璜	(21)
《中华民国史》岂可敷衍塞责·····吴相湘	(27)
民国史的几个重点——兼谈编修	
“中华民国史”的问题·····严 敬	(29)
对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相关问题之研究·····秦孝仪	(34)
史学家谈修纂中华民国史问题·····李雅卿	(45)
千万不可官修民国史·····赖渊光	(49)
“第二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发言纪录(摘载)··李璜等	(53)
中共对辛亥革命之评价·····吴安家	(57)
评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山田辰雄	(79)

书评:《民国人物传》第一卷	徐冠三 (85)
北京版中华民国史	田 雪 (89)
现代中国的孙文研究	和田悌一 (90)
国父年谱要认真改编——由大陆刊印 《孙中山年谱》说起	吴相湘 (93)
国父与郑藻如关系初探	吴相湘 (99)
孙逸仙——中国将说些什么?	琳达·贾温 (113)
评李宗一著《袁世凯传》	波多野善大 (115)
南京档案馆和民国史研究规划	黄宗智 (121)
日本成立民国史研究会	石井明 (123)
最近日本研究民国史状况	山田辰雄 (128)
喜见《中华民国史》的出版	香港《文汇报》社论 (138)
附录: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书目	(140)

“民国史研究座谈会”开场白

台湾《传记文学》编者

由于中共计划并已着手编写《中华民国史》，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震撼与关切。许多史学家纷纷呼吁我们要赶快修史、要求政府尽速开放史料，史料机构负责人也多次发表谈话，颇为热闹了一阵。但这件事有如台风过境一样，中共修史的工作正在以庞大的人力、财力甚至借重外国学者继续进行之际，事隔几个月，我们的史学家认为已尽了言责，我们的史官认为已驳斥过了，中共修史的一切震撼与关切已化为乌有了。迄今未见官方或民间做出任何有系统的修史计划，遑论有什么修史的具体工作进度或成绩可言了。

我们历史研究工作始终是被动的、零乱的。犹忆前十数年，由于大陆封闭，美国流行研究中国近代史热，各图书馆各学校以大量美元经费在台湾搜购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史料与史籍（甚至有些美国学术机构常川派人驻台担任“书探”工作），因而引起台湾出版界翻印古籍与旧史料的热潮，这固然对国内史学研究贡献极大，但曾几何时，美国人买书的兴趣没有了，我们印书的兴趣也没有了。当年以高价暴利换取美元的旧史籍，已沦落在旧书肆中而一折八扣也无人问津了。

我们固可美其名曰我们是“自由研究”、“自由贸易”，但有关当局始终漠视国家历史研究工作，实在是由来已久的老毛病。

本刊有见及此，特在欢迎李璜（幼椿）教授来台之便，举行一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虽然令人颇有台风过境谈台风之感，但我们希望藉这个座谈会再度引起史学家与政府当局的重视。

如果说三十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是一片空白，这也是极不公平的，尤其是民间学者三十年来以个人有限财力、有限精力所做的研究工作仍是非常可

观的。只可惜这些工作多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说各话，而不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领导的“团队工作”。因此，虽然琳琅满目，但无法产生一种统合的效果，更难在国际史学界占一席之地，进而在国际上发生说服与影响的作用。

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是统战的花样，不是史学研究；是为了替所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算一笔总帐，无视中华民国其后三十年的存在，更不会为历史保存真实纪录。其阴谋、其用心尽人皆知，本不足道，但如果待他们的“皇皇巨著”数十册数百册出现在国外图书馆的书架上，到那时我们只有被迫接受“缺席裁判”了！

为了要“迎头赶上”，不仅希望有关当局与国内外史学家重视我们又一次的严重而沉痛的呼吁，我们更希望：

一、在动辄千百亿元的“十大建设”之外，增设一“民国史研究建设”，拨一亿元即能将这一“建设”规划妥贴，不久必可“开花结果”。

二、以一亿元设置“民国史研究基金”，鼓励历史研究工作与奖助历史研究著作。今日工商业繁荣，筹捐一亿元已算不得什么大数目，试观社会上各种为个人出锋头或为机关办报销而设置的“基金”何止千百种，每年必例行颁奖一次，其意义均不如“民国史研究基金”之来得重大。

三、设置“民国史研究出版委员会”，直属行政院，至少网罗一百位有成就的史学家从事有计划的研究工作，其重要性绝不在现已有的原子能委员会、公教住宅委员会之下。

四、集中或合并各史料及图书机构的搜藏，便利民国史研究工作，不必各有“秘本”、各有“特藏”。如果做不到，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也要筹专款编印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全中华民国全台湾为范围的“统一联合目录”，供中外历史学者研究参阅。

为推动民国史研究，要做的事还很多，我们只提供几个“荦荦大者”（其实，只要有决心，均简易可行），以期使民国史研究工作，由呐喊阶段而进入实行阶段。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六期）

官方修史与民间修史应该齐头并进

李 璜

刚才听到主席念了一遍有关的几个文件，我觉得中共能够真正去搜集史料来编写中华民国史，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以搜集史料来说，并不是像装垃圾桶样，无论甚么材料，都乱七八糟的摆了进去。如像中共早期发表八大本太平天国史料、四大本捻军史料等等，简直毫无章法，连分类都不清爽，徒显其多而不精。至于毛泽东死了，现在正在贬毛，或者“夸大狂”要减少一点，写的态度上可能会开明一点。但我仍认为他们的开明（即所谓“实事求是”），也不过一种小脚放大点的办法。从绍唐手中文件上两句话，就可以看出，中共目前对历史的视线，仍旧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文件中说：“反动的袁朝与北洋军阀”、“反动的国民党统治”，以至汪精卫都在内，也要为之立碑立传。文件中又说：要以马列思想及毛思想为指导方针来编纂。就这两段话，便把“信史”二字毁灭了！我不能信这种个人先下判断，先限原则才去搜集、批判与编纂，而能成为信史的！何况文件上还说，特别注重毛泽东言行的真实性。毛本人的“真”和“信”就大有问题！故我说，中共这回编史，即使比毛开明一点，也不过是小脚放大一点而已。这类以马列主义的教条（dogma）来编史的欧美左派作品，我看得不少，但大半用教条将史事歪曲，成为假像，禁不起证验的。

譬如以刚才绍唐所讲的传记文学七月号“少年中国学会专号”上五四运动来说，中共说：“五四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很明显，那时中共的党在那里还不知道呢？（刘社长插话：中共的党在民十始成立的）。我就以毛泽东来说罢，民国七年秋，我们发起“少中”时，回忆当时情形，李大钊、王光祈、周太玄、张梦九、陈愚生、毛泽东等，我们七八人每周六聚餐于陈宅，畅谈政治。当时毛泽东自认他的老师李大钊还是一个喜做旧诗，思想正在无政府主义

与民族主义之间（中国文士其传统思想在清末民初似此者多），而无非认为俄国革命，其社会主义乃能照顾到弱小民族，甚为难得。李大钊即曾于餐聚中向我们这样谈到过，而且他并没有共产主义的主张，其所以主张中国革命，要注意俄国作法，亦偏重民族主义这一点上。这个话固为我所亲闻，而西方学者研究李大钊在民国七八年间的思想中，也称并无共产主义。即中共曾出一本足供参考的书，叫作《五四时代期刊介绍》上，也说过在一九一八年代，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赞成俄国革命的文章，乃是民族主义的，而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初由陈望道译成中文，是在一九一九年年底，且错误甚多。在五四前后，王光祈提倡工读互助，周太玄赞成田间工作，而李大钊和之，主张新村运动，自耕自给，而一面读书，此其田园派诗人之具体主张而已。这种自命“羲皇上人”的无政府思想，在中国可以陶潜为代表，然而其间又有民族思想的浓厚味道。此所以五四以后，在民十左右，俄国共产主义输入中国，能够在思想上立脚，并非无产阶级者的思想在生出力量，乃是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帮了大忙。

〔刘社长（即《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本书编者注）：李先生刚才说李大钊在五四时代是田园派诗人思想，而西方研究者也认他彼时是民族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那么，李大钊是在甚么时候转变的呢？可不可以谈谈。〕

关于李的转变，在座沈云龙先生在其《中国共产党之来源》书中已经研究过，我在拙著《学钝室回忆录上卷》第二章也说过这一点。李的转变，主要是由于俄国的胡丁斯基（G·Voitinsky）来中国煽动吴佩孚。我们要知道当时俄共投机的对象是实力派的北洋军阀。当民九之际吴佩孚虎踞洛阳，声威甚盛，而吴有一个参谋长白坚武与李大钊是小同乡，胡丁斯基就从李下手（由北大俄文教员介绍）因而得打通白，接近吴，并且居然说动了吴，以吴要北上兵运打仗，交通线甚重要，必须先将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因之长辛店便才有了工人聚乐部，为后来共产党人呼应北京政治活动的老巢。不过对吴佩孚乃并未成功，因吴在不久感到工人组织危险（曾罢工要挟过吴一次），乃解散了聚乐部，但共产党因是生根，而李大钊也就转变成为共产党，不久，更加尊号为“南陈北

李”了。不过李究竟只是诗人的头脑，而毛泽东受其影响，乃成为实干派。毛的书底子甚差，中学都未毕业，我们在民七秋聚餐时他亦甚少发言，但偶一发言，至为冲动，说干就要干，不赞成我们只是坐而论道（详见拙著回忆录中“我与毛泽东在民七往来的印象”一节）。因之，有个趣事，即若干年前（大概一九六八）我在旧金山伯格莱加州大学被邀参加座谈会，一位中国籍讲师陈君（专研究梁漱溟，出版有书）一开始便笑问我，我在国内或在美所见的“少中”会员学者不少，都是文雅而书卷气甚重，今见李先生也是彬彬儒者，何以“少中”会产生一个山寨出身，杀人魔王的毛泽东来！我笑答陈君：因为我们读书太多，所以就不会去当山大王，而毛读书甚少，他便能照《水浒传》办法去造反，碰着日本侵略，又有俄国帮助，便得占大陆，这可以说，我们读书读坏了！引起大家一笑，然后开始讨论毛思想是些甚么。

今天我们本题是谈民国史的编纂问题，因为提到毛思想问题，就扯远了，说了一大套题外话。我有一篇长文叫《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上看中共的成长与衰落》，这篇中文稿是预备译成英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所设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在一九六五有三个研究所，其中之一为专研究中共）去讲演的，这篇中文稿也有两万多字，曾载台北民主潮，现汇入本社出版的《学钝室论政选集》中一七一至一九四页，可以参考，我就不再说下去，耽搁时间了。

〔刘社长：我们已知中共要修中华民国史，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不能承认中华民国到一九四九年就算完结。因为直到现在，中华民国还依然存在，而且我们依然是中国的正统。我们应如何来修这段历史？〕

我认为应该由民间学者合起来修。如果像从前断代史，专用前代实录或皇帝起居注，奉命来写官史，那种办法就不大能客观的搜集与批判，尤其是在综合方面。例如二十四史，每一朝代完了，下一朝代接上去，总要命史臣纂修前朝的所谓一代兴亡。在开国的兴的时候，总是天生奇才或天纵聪明，太祖高皇帝都是英明了不得的，而亡国之君，固然该骂，也并不是一无可取。如贾谊过秦论那样，就好像列宁骂资本帝国主义，一无是处，只有予以打倒！总之，奉命修史，总必有些忌讳，一涉及忌讳，便影响信实，便难完成信史的相当价值了。史记之所以能为史之模范，至今读之有生气，就因为它是私人父子所合

编，褒贬都不大受着像奉命而编的那种限制。我看中共这回所要编的中华民国史，固如我前面所说，要受着官式思想的限制；就是我们政府所设立的国史、党史各机构，这多年努力所编出的，如中华民国史事纪要、革命先烈传等，以及编年、国父传记等以至许多党史资料，我得阅及的并不多（只有黄季陆馆长是我的患难之交好朋友，他给我阅的国史馆中资料不少，对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档案资料我也偶然阅及，且介绍我的学生自香港来披阅），然而这若干大类的民国史资料，大都很可宝贵，但客观性都不够，亟待批判，方能综合成为信史，而批判就非私人及其共同工作者莫办了。我何以这样不信公家修史？因为我读过军事机关编纂的两部战史，一部是抗日战史，一部是剿匪战史。这两部史修得并不坏，尤其是抗战史，在表面上看起来，甚为严整；但统计数字与作战图表，虽甚是明白，而且令我们看得出这个仗是军令森严、将士出力，如何打法，清清楚楚。不过好像我们是在山上看山一样，但见群峰耸立，何其高也，而不见下头的面是如何的广阔；换言之，只见统帅部的号令部勒，将士的受命作战，而不见老百姓在战时生活，是如何的艰苦，是如何的出力与牺牲。且将尚未全面抗战前的东北义勇军的作战，简直未加注意写上，这就太不客观了，这就只算政府抗战，而非全民抗战也！关于剿匪史也有类似的缺点，竟将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徐向前红军打入四川，占领川东北七县，单靠四川军人奋勇将他打出巴山川境两次，死了川中旅营长不少，而匪军也大受创，只字未提。在剿匪史上，只从中央军入川剿匪注意起，亦欠客观。——这些我在《现代史料批判》文中也曾说过，比较更详细。（这篇讲演文稿我载在新近台北九思出版社再版的拙著《汉学论集》里面，我将请秦贤次先生代我购送在座诸位各一册。）

至于外国人写的中国近代史或传记就更差了，我在这篇文章中也曾批判过。美国哥大有位叫鲍尔曼的，募了两百万美金，花了五六年时间，印行了几厚本《中华民国名人辞典》，其中错漏百出，笑话甚多！我没有钱买一两百万美金一部（共四册）的贵书，我只在图书馆打了若干拷贝来参考。幸好第二册未出版前，由吴俊升兄的世兄将曾琦、李璜两个小传底稿转寄与我，说是由别人所托。我一看便大惊，“曾琦初在张作霖大元帅处任北京卫戍司令”。曾琦是

文人教授，中国青年党党魁，在小传后面明明写得有，何以一开头变成武人，而当上了卫戍司令，岂非张飞杀岳飞的笑话！果然我一想，张部下有一王琦，写小传者竟把曾琦与王琦相混了啊！我才把这大错改了，并加以注明。谈到我，作者在后来出版上又在“李璜小传”前面去加顶帽子，一开始便说：李璜与曾琦发起中国青年党，号称第三势力，原来是为调和国共，免除内战……云云。真所谓“此话从何说起”！“中青”的发起，在民国十二年，那时候，那来的国共内战？诸如此类，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仓卒出书，错谬更多，不足为信。因此我对于美国人保存的与研究的近代中国史料及其作品，虽为数不少，只能供参考，但须严格批判。

在大陆，固然中共写史，不敢批判毛泽东，目前当是如此。然而在台湾，孙中山先生也有点“神”化，今天还是不能随便批评的，至少在政府官办的史学机构中，有若干这一类忌讳存在着。而民国史，如果要存信，则从开国革命之役等起，每役的功罪是非，就不能不谈，一谈便有忌讳。此中华书局曾出版过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之所以被禁毁版也。当然今后我政府对学术的自由开放，正日形“言者无罪”，或者不会动辄便犯禁了。（我的《学钝室回忆录》下卷在香港登载过，或者将来也有机会成书时仍交与传记文学社印行的，但两年前还不敢便交绍唐兄，恐使他为难。）

总合起来，我前面的话：中央赶修民国史，是想赶快结束中华民国；而我们赶修民国史，乃是与中共相反，要延长中华民国。但赶修是为政治的意义多，不纯是学术的意义。我想，政府一定有他的主意去与中共敌对，公开印行史料也好，综合以往所出编年或若干成书，合起来出大书也好，只要舍得花钱，加强国史馆、党史会以及中研院的近代史所的人力与物力，这种政治目的，不难达到。但为求信求真，必须注意广征史料，愈周详愈好，而且要经内行，不受干扰的加以严格批判，不要忌讳，且不要妄信权威，尤其欧美自命的权威。像这样做，则应私家去着手。譬如绍唐兄所主持的传记文学杂志，可以说，从民国五十一年六月创刊号起，就已算在开始搜集民国史料，至今十八九年，所搜得的而且多是活人足以证验的好史料，足以为民国史大增生气！我认为刘社长不宜妄自菲薄，而须当仁不让的，就来组织一个民国史的私家编辑

室，分门类指定学人搜编史事，我愿附骥尾，来一个！（本发言稿系照传记文学社纪录改正）

（本文是李璜在台湾《传记文学》社举行的“民国史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六期）

我对纂修中华民国史的看法

沈 云 龙

自从今年五月间中共传出编写《中华民国史》的消息以后，此间史学界、舆论界对此一问题的警觉和做法，曾多所论列，大体侧重在要求史政当局从速开放史料，好让治现代史的学者专家自己从事纂修客观而详尽的中华民国史，不容中共越俎代庖，任意歪曲，淆惑视听，以达到其“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鬼蜮用心。而更为具体的，则是行政院答复立委李志鹏的质询，明白表示：为期国内外人士对我中华民国有正确之认识起见，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已决定在六十九年度内，着手编辑“中华民国建国史”，将甲午中日战后之史实，以简明扼要之方式予以叙述。至于该署如何取材，如何编排，及编辑要点如何，当邀请国史馆、党史会、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各级学校历史教师及史学专家共同研商，俾臻完善。我对这些意见，都未便苟同，以下说明我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与其寄望于公家史政机构来纂修中华民国史，牵涉既广，顾忌尤多，远不若私家个人执笔，可以奋笔直书，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来得简便而自由。即以传统的我国二十六史而论，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纯系私人撰著而非史官撰写者，共有七种：包括宋范曄的后汉书，晋陈寿的三国志，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唐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以及民国柯绍忞的新元史。

第二类是以史官的职位或奉敕私撰者，共有八种：分别为汉司马迁的史记，后汉班固的前汉书，梁沈约的宋书，唐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北齐魏收的宋书，唐李百药的北齐书，唐令狐德棻的周书等。这里所说的史官，相等于今天国史馆的纂修、协修。他们能以个人之力，完成修史工作，我们应该资为效法的。

第三类是官督私修，由史官多人集体重作，而以官高者署名。此类方式，只有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一种。

第四类才是纯由国家开馆设局，提调史官分别撰修而以官位尊贵者负其名义，这类官方修史的制度，共有十种，包括唐房玄龄等的晋书；唐魏徵等的隋书；后晋刘昫等的旧唐书；宋薛居正等的旧五代史；元托克托等的宋史、辽史和金史；明宋濂等的元史；清张廷玉等的明史；民国赵尔巽等的清史稿。

由上分析，可见一般视为正史的二十六史，绝大部分为私家或史官个人纂修，由官修者尚不及五分之二，若就其内容而言，私家修史往往更为严谨，而通常有较高的评价；公家修史，除明史外，大多草率芜杂，颇多讳饰阿谀，褒贬失真，不足资为采信。因此，以私家修史的方式来撰写中华民国史，不失为简易可行的办法。

以我个人研究民国史和写作经验来说，这些年来先后撰写中国共产党之来源、黎元洪评传、段祺瑞之一生、徐世昌评传、黄郛年谱、尹仲容年谱，以及为本刊写“民国史事与人物”专栏等等，看上去只是为个人事迹写传记，为某一重大事件叙本末，实际上无一不与中华民国史息息相关。我的史学史识诚极有限，能力亦甚微薄，但我深信以私家之力，修成中华民国史，并非决不可能之事。不过，私家修史，当然有其困难。我国历代史家相诫，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否则将会遭杀身之祸，因此，除司马迁外，都是后代修前代之史，几乎成为一定的公式。但现在的情况与往古有异。以前的君主专制时代，史家容或因恐惧直笔而遭祸；现在是民主政治时代，人民有言论自由的保障，相信这种顾虑已不复存在。只要当政者能祛除若干不必要的禁忌，放宽尺度，有接受批评的雅量，私家修史尽可就事直言，言必有据，不掩饰、不谀过、不歪曲、不捏造，舍弃出主入奴的成见，摒除成王败寇的观念，自可为中华民国留下一部斐然可观的“信史”！

其次，以私家之力修中华民国史，另一遭遇的困难，是史料的搜集不易，且亦无法尽窥“宝藏”，但这方面我个人也认为并非不可克服。现在往往有人批评史学界未曾致力于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而史学界就推卸于史料散佚或未完全公开，以致无法问津，无从着手，我以为这只是一种懒惰或逃避现实的借口。事实上，海内外公私各大图书馆，存有民国史料甚伙，其间中西文杂然并陈，又散处各地，乃至有些是公家档卷如大溪资料之类，或涉及私人珍藏，至今仍不愿公开，